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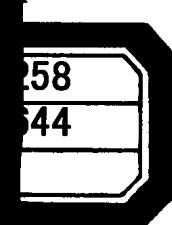
人物传记

第二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

第二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征求意见稿)

中华书局

1986年2月

k258
41

内 部 发 行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 物 传 记

第二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10 1/4印张·151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421 定价：1.75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 | | |
|------|---------|------|
| 杨衢云 | 袁鸿林 | (1) |
| 沈缦云 | 汪仁泽 | (6) |
| 叶楚伧 | 郑春燕 | (11) |
| 卫立煌 | 严如平 | (16) |
| 张之江 | 宗志文 | (24) |
| 王陵基 | 刘识非 | (28) |
| 徐 堪 | 马宣伟 | (34) |
| 上官云相 | 王家鼎 | (38) |
| 李延年 | 王家鼎 | (44) |
| 老洋人 | 李国强 | (51) |
| 褚民谊 | 黄美真 张 云 | (56) |
| 郝鹏举 | 王家鼎 | (62) |
| 卢作孚 | 周凝华 | (67) |
| 李烛尘 | 熊尚厚 | (73) |
| 何北衡 | 袁嘉新 | (79) |

| | | |
|------------------|---------|-------|
| 马应彪 | 熊尚厚 | (84) |
| 苗杏村 | 王家鼎 | (89) |
| 刘海楼 | 邢汉三 | (94) |
| | | |
| 邹韬奋 | 宗志文 | (96) |
| 马叙伦 | 宗志文 | (104) |
| 侯德榜 | 熊尚厚 | (110) |
| 谢无量 | 杨伟立 马宣伟 | (115) |
| 陈 达 | 汪仁泽 | (119) |
| 凌鸿勋 | 娄献阁 | (124) |
| 张恨水 | 宗志文 | (131) |
| 王云五 | 熊尚厚 | (137) |
| 赵紫宸 | 寿祝衡 | (144) |
| 孟目的 | 寿祝衡 | (148) |
| 附：《人物传记》第一至二十辑目录 | | (151) |

杨衡云

杨衡云，名飞鸿，字肇春，衡云为其号，福建海澄县人，1861年12月19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于香港。祖父杨福康，清廪生，曾署理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后弃官出洋，居南洋槟榔屿。父杨清河，生于槟榔屿，十六岁时返回本籍，后定居香港；曾先后在福建、香港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一些书院的教员。

杨衡云幼从父读，十四岁时入香港一家英国海军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而断去右手中间三指。于是转而学习英文，考试常名列前茅。二十岁毕业后，任香港圣约瑟书院教员，后改就香港招商局船务书记长，1894年转任英商新沙洋行副经理。

杨衡云少时曾习拳术而精技击，并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富爱国思想。他为人仁厚和蔼，有长者风度，只要见同胞受外人欺凌，则怒起而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1883—85年的中法战争，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为结局，对他刺激颇深，其思想便由爱国发展到立志反清复汉，并曾去广东寻求同志，但当时风气未开，并无应者。

1887年，杨衡云结识了香港域多利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学生、具有反清意识的谢缵泰，并引为知己，结为拜盟兄弟。1890年，他与谢缵泰联络了在外人所办书院、洋行中求学、任职的爱国青年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等人，开始在香港酝酿发起辅仁文社——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并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逐……满族鞑虏的运动。”①1892年2月13日，辅仁文社正式设总部机关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社员共十七人，杨衡云被选为会长。辅仁文社的社纲有六条：“（1）纯洁品性至最高程度；（2）禁染社会恶习；（3）为未来青年作表率；（4）经种种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获得西方优秀科学文化；（6）学习如何做爱国者，如何从事爱国活动和如何消除祖国所蒙受的屈辱。尽心爱

国。”②提倡西学、开通民智和爱国维新是辅仁文社的公开活动，社中曾购置多种新书报，以供讲研和传播。杨衡云和谢缵泰系社员中学习西学最优秀者。谢曾于1894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号飞艇的设计方案（方案发表后曾得到外国著名飞艇学家的高度赞赏）；杨则对西方政治理论研究较深，成为第一个明确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党人。而在暗中，以杨、谢为核心的部分社员时常密谋反清革命，还曾探访过广州清政府驻香港的特务机关，以察清方的虚实。辅仁文社的总部也曾受到香港英政府的怀疑，时有西人的警探出入其间。

1892年秋，杨衡云经尢列的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常在一起抵掌畅谈救国大计，以至达旦不倦。杨首倡孙杨两派合作，主张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与辅仁文社共策进行；孙表赞同。翌年冬，孙与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集会，孙根据杨的主张，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与会者均表赞同，但不及制定会名，亦未形成具体组织。杨由于居住香港，未能到会。次日，尢列去香港，向杨报告会议情况，杨大为称好。其时，孙、杨之间已在反清革命的宗旨上取得一致，只是对于共和国制度，尚有出入：孙主张“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则非造成民国不可”③。尽管有此分歧，孙、杨之间的交往和有关合作的筹商，毕竟为后来孙杨两派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杨衡云、孙中山等革命者，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们加速了两派联合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的步伐。恰值杨衡云和谢缵泰等人正苦于很难找到新的革命同志，以发展辅仁文社之时，孙中山已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杨衡云便与孙中山等人筹商两派联合，共组革命团体。2月，香港兴中会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杨衡云率谢缵泰、周超岳等部分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并取消了辅仁文社。

在孙、杨的共同领导下，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即着手准备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准备大致分两头进行：孙派在广州，杨派在香港。香港的准备工作在杨衡云的亲自主持下进展很顺利，筹措军饷、外交宣传、购运枪械以及募集会党等方面的成绩均十分显著。在起义筹备基本就绪时，兴中会主要成员

于1895年10月10日举行会议，选举兴中会会长兼起义后临时政府总统。会上，孙杨两派争相拥戴自己的领导人孙、杨出任，几乎导致两派分裂，后经孙中山退让，杨遂被两派共同举为会长兼总统。起义原订于10月26日（重阳节）发难，不料起义前两日，因事泄而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由于杨衢云在这次起义中的领导作用与孙中山相同，故清政府广东地方当局把杨与孙并列为“匪首”，各出赏格“花红银一千元”，布告缉拿^④。孙、杨等人被迫外逃避难。11月13日，杨离港前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并经过海峡殖民地^⑤而去南非。孙先于10月30日偕陈少白、郑士良离港赴日。

杨衢云到南非后，便在当地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努力发展同志。1897年，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建立兴中会分会。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间，杨在返回香港的途中，又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等处建立兴中会分会，并与当地的反清秘密团体建立了联系。期间，孙中山也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但是孙杨两派由于起义前的争夺会长和起义失败后的互相埋怨，彼此互不联系长达两年之久，致使香港兴中会实际上陷于瓦解。1898年3月21日，杨衢云携家眷抵达日本横滨，以教授华侨子弟英语为生。不久，杨主动找到孙中山，恳切要求两派抛弃嫌隙，重新共事；孙表接受。两派从此恢复合作直到庚子惠州起义。杨始终维护两派合作，实是两派合作的纽带。

1899年4至6月间，杨衢云在谢缵泰的促使下，曾同康梁一派有所接触，并与梁启超在横滨举行过会谈，筹商合作事宜。起初，杨与谢缵泰一样，认为康梁一派也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其“和平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们可能会乐意同革命派联合，共襄反清大业，因此对与康梁一派的合作颇怀期望。但后来杨却发现：“康党甚傲慢……不愿同我们平等相处；总想要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全都服从他们。”^⑥因而与康梁一派有关合作的商谈并无结果。以后，杨对康梁保皇会明确表示谴责，断绝了同康梁一派的联系。

1899年11月，孙中山指示陈少白、毕永年、宫崎寅藏等人邀哥老会、三合会首领集于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孙以不宜两会长并存为由，请杨辞去兴中会会长职。杨当即表示了赞助孙中山领导、维护

两派合作的诚意，并说：“为了有利业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务了。”⑦当时，杨闻孙正在筹划惠州起义，便自请回港筹备。1900年1月，杨从日本到达香港，经与谢缵泰商量，毅然提出辞职书，荐孙自代兴中会会长，而从事革命运动则更加努力。他每日去兴中会在香港的机关《中国日报》社，凡筹备起义的事，无论大小，均奔走不倦。4月26日，杨离港去日本东京见孙中山，商量起义策略。6月17日，杨与孙同轮抵香港，经当日会议议决，杨与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在杨的积极影响下，已决意与孙中山分手的谢缵泰，也暂时中断了其独自谋划的另一次起义的准备，重与孙派共事。杨、谢两人还发展了李纪堂、史坚如为兴中会员，李、史两人均在惠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上旬，惠州起义在三洲田打响后，起义军屡败清军。清廷南海县知县裴景福惊恐万分，乃于中旬派植槐轩、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提出三条“议和”条件：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杨考虑到原定由香港和台湾给起义军输送枪械和干部人员的方案均已无法实现，起义军不久将援绝弹尽难以坚持，因此错误地以为可利用这次“议和”，使起义军潜伏下来，以便“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⑧。杨将自己主张接受“议和”的意见电告孙中山，请示可否，遭孙拒绝，“议和”遂止。

惠州起义由于弹尽援绝而失败，杨衢云被列为要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因此同志多劝杨出洋暂避。杨不忍虚糜革命经费，在香港设学校教授英文以自给，并慨然表示可为革命一死。1901年1月10日，杨正在授课，突然遭到清政府所派凶徒的枪击，次日不治身亡。杨衢云对于辅仁文社、香港兴中会的组成和发展，对于孙杨两派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中的合作，都有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在横滨得知杨的噩耗，异常哀痛，曾出名主丧，发讣告数百份于中外各地，又于1月26日召集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募集捐款一千二百余元恤其遗族。

(袁鸿林)

注：

- ①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英文版）。
- ②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见薛君度编：《中国近代革命领导人物》（英文版）。
- ③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南京版）。
- ④大同学会编辑：《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第一卷。
- ⑤“海峡殖民地”为1866年英国合亚洲马来半岛南部之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组织而成之旧称。
- ⑥《杨衢云致谢缵泰函》（1899年6月6日）。见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 ⑦同①。
- ⑧冯自由：《杨衢云事略》。见《革命逸史》初集。

沈 缓 云

沈缓云名懋昭，以字行。1869年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吴县，祖籍江苏无锡。他原姓张名祥飞，父亲张桐龄是个举人，母亲郭氏也知书善画，在家乡设塾授课。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全家避居上海。父在某绅商家任家庭教师，母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清心女书院当教师。祥飞十二岁时，随母信仰基督教。他先在家自学，旋蒙培雅书院（约翰书院的前身）校长颜永京的允许，进该校为插班生，学习勤奋，品学兼优，深得师长赞许。此时，无锡富商沈金士因子早亡，遗一独生孙女，拟招赘孙婿，承继家业。经校长颜永京介绍张入赘沈家，遂改姓字为沈缓云。其后沈家专聘家庭教师教读四书五经，他应科举考试，二十岁时中举人。但他顺从沈金士的原意，自己也有志于振兴实业，放弃致仕之途，在自办的铁工厂里学习技术，助理家业。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面临瓜分危机。沈缓云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深感振兴实业，首重金融。此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纷纷开设，沈遂于1906年与无锡实业家周舜卿等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集股五十万元，实收半数，推周舜卿、王一亭、顾馨一、林虎侯、徐子云等为董事，周舜卿任总经理，沈缓云任协理，主持日常行务。沈缓云办事精干谨慎，经营得法，该行业务得以迅速发展，次年又获得钞票发行权，并代理清政府上海道署的库银，信用益著。此后陆续在南京、天津、无锡、北京等地开设分行，营业蒸蒸日上，存款高达七百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亦达一百十万元。

沈缓云在从商之余关心时局，阅读多种中外报刊杂志，并热心教育慈善事业。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谋组自立军，沈助饷一万五千元，是为沈以雄厚资力从事政治活动之始。1906年，沈与人合办上海竞化女子师范学堂，由其妻沈钦苓任校长。同年沈受马相伯聘为复旦公学校董，又与高翰卿、王一亭、李平书等创办上海孤儿院于南市雨化堂，后又在龙华觅地二十余亩，建屋四十余楹，收容孤儿三百余人。

1906年，沈缓云组织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自任会长，号召青年锻炼

体魄，从事军事操练。次年该会与商学补习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上海商团公会，参加操练的会员数百人，沈亦带头出操。该会后来成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基本队伍，光复上海时是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自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后，国内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于右任等人1909年在上海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鼓吹革命，所刊文章慷慨激昂，沈缦云心向之，亲往报社访于右任，倾谈之下订为莫逆，并慨助经费万余元。1910年，沈被上海总商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勋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他感叹：“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宜尽，请自此辞。”①他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②。在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他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叶兆崧的介绍，是年初冬参加同盟会，是为沪地上层资产阶级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在同年底至次年初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10月，于右任等人再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五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总站，迎送来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主持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困难商借旅费等，沈也有求必应③。此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四万五千两，委托其兄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张祥和向德国购得步枪三千支、子弹五十万发，惟从欧洲运经香港时，被香港当局查获，全部没收。

1911年初，英、俄加紧对我边境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甚，同盟会决定指派沈缦云、叶惠钧等人组织反清武装力量。3月11日在二千多人参加的“保界会”成立大会上，沈即席演说，号召“准备实力”。然后沈又与宋教仁等发起组织全国义勇队，由宋编订章程，但未成立前即被清政府侦知，勒令解散。接着“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志士创办‘全国商团联合会’”④，推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于4月8日成立，会员千余人参加军事操练，为上海的武装起义作准备。此后，同盟会于6月联合沪上各团体组成“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⑤的反清联合军事团体——中国国民总会，由沈缦云任会长，其中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与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

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上海同盟会党人多次集会，商议响应武昌起义的部署，“初议上海视南京举动”⑥。10月24日陈英士、宋教仁、于右任、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在同盟会紧急会议上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争取商团重要人物李平书等人加入起义，并指派沈缦云担任此一任务。沈与李原系知友，经试探，李表示愿意站到革命方面来，于是约定李与陈英士会见。李主以“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⑦，并说动沈信卿、吴怀疚、莫子经等人于24日与陈相见，共同约定以保民为宗旨参加起义。从此每晚集会商讨，后又有纽永建等人参加，队伍不断扩大。11月1日因南京方面倾向革命的第九镇被调离，一时难以发动，而武汉方面清军反扑，形势危急。陈英士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解救武汉之危”，并立即进行布置。

11月3日下午，上海发动起义，闸北一路进展顺利迅即光复；而进攻江南制造局一路遇到顽抗，陈英士企图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被敌拘禁。此时清方声言：将从宁、松两路反扑，届时“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⑧，形势紧迫。沈缦云与王一亭、李平书、叶惠钧等立即商议于商团公会会所，决定以商团为主力再攻制造局。商团集合千余人，临行前沈即席痛哭陈词，闻者动容，士气高涨，连夜围攻制造局。次日黎明胜利攻克，全市光复。是年年底孙中山回国抵沪时，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一方赠予沈缦云，以彰其功⑨。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英士任都督，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由于事起仓卒，军无宿储；而清政府所设各税捐局所，已于起事时明令裁撤，原主事者挟款逃遁，以致饷糈无出，而各地军队集沪者达数万人之众，军政各费皆需财部筹措，每晨鹄候环索者数以百计。沈缦云首当其冲，从黎明直至深夜奔走筹款，任劳任怨，而流言蜚语层出不穷，恫吓之信件日必数件。信成银行前后垫款达三十余万两，犹不足应付⑩。原存信成的前清上海道公款二十六万余两，也被各国驻沪领事团强行提取，充作赔款，不及扣留，面临财政危机。沪军都督府委派沈缦云另组中华银行，于11月21日在沪成立，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以应急需。12月3日沈辞去财长一职，改选朱葆三继任。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委沈缦云为驻沪理财特

派员，后复委为劝业特派员。同盟会特派沈为本部理财部干事兼南洋群岛交际员。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研究实业建国计划，以开办金融机构为实施计划的基础，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自任名誉总董，指派沈缦云为筹备主任，由沈往南洋一带向华侨募集股款。次年事成回国，该行于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开业，沈任总理。不久，孙中山发起组织中日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沪召开筹备会，孙自任筹备员长，沈缦云、张静江、王一亭、宋嘉树、朱葆三等任筹备员。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并向英、法等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筹充武力统一中国的战费，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在江西、江苏、安徽、广东以及上海等地举兵反袁，发动“二次革命”，不久失败。孙中山、陈英士、李平书等流亡日本，沈缦云全家亡命大连。沈在大连继续从事革命秘密活动，经常与当地工商、教育、新闻、宗教界人士接触。1915年陈英士、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到大连，要沈联络关外党人，筹组革命机构，开办报馆，加强反袁宣传。袁世凯侦知沈的行踪，如芒刺背，非去之不可。此时有一自称在奉天（今沈阳）办报的同盟会盟友张复生者，常来晤谈，执礼甚恭，并称奉天有一报馆拟出盘，沈遂被邀往奉天一行，观看该报馆馆址。沈离奉天上火车前，张殷勤设宴饯别，沈数小时后回到大连寓所，顿觉头晕欲吐，四肢麻木，全身抖颤，急延日本医生诊治，谓系烈性食物中毒，已难挽救。沈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你这盟友已变成叛徒”，“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你能害我的肉体，不能损我的灵魂、灭我的志愿”等^⑪。延至1915年7月23日晨，抱恨逝世，时年四十八岁。

（汪仁泽）

注

①天津《大公报》1910年6月12日。

②王蕴登：《无锡沈缦云先生之墓志铭》。

③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称：“戊申（1908年）、乙酉（1909

- 年)以后，革命同志在上海之活动，无论其事业为教育为宣传，乃至四方途经上海者，或多或少无不感受云先生物质上、精神上之鼓励。”(原函抄本存沈氏家属处)。
- ④《时报》1911年4月9日。
- ⑤《中国国民总会材料》。《时报》1911年5月8日、6月12日。
- ⑥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卷三，第287页。
- ⑦同⑥。
- ⑧伍特公：《上海商团克复上海纪略》。1947年回忆，抄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⑨沈子高：《沈缦云的一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2页。
- ⑩沈云荪：《上海信成银行始末》。刊于《近代史资料》总55号第112—119页。信成银行于沈缦云亡命大连后因无人经营，1913年9月临时股东大会公推查察员进行清查账目，至1914年秋将存款全部发还，发行之钞票亦如数收回。各地分行相继停业，总行亦宣告清理。
- ⑪同⑨，第143页。并参见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思昔年英士先生光复上海之时，商界中之努力相助者以缦云先生为多。即癸丑(1913年)之役，缦云先生亦为最出力之重要人。是以被忌于袁，终至客死大连”。

叶 楚 伦

叶楚伦原名宗源，字卓书，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廿八日）生①，江苏吴县人②。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叶凤巢是晚清秀才，因不事生产，家道中落。叶楚伦十一岁丧母，由姨母抚养长大。

叶楚伦自幼随父读书，童年先后寄读于吴江同里任氏、叶氏家塾，后归故里拜陶小沚为师。1902年参加县府试，名列前茅，院试时落榜。翌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叶楚伦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暑假后，转入浙西南浔镇庞青臣主办的浔溪公学，为高等科学生。入学没几月，发生学潮，浔溪公学解散。叶到桐乡县的濮院镇，召集原浔溪公学的八位同学在一个名叫沈维伯的人家中“研讨学问”。这时正值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叶楚伦和他的同学秘密买到此书进行传阅。逢星期日，他们还在濮院镇公开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是叶楚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开始。1904年叶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学满三年毕业时，因考卷舞弊案，叶等痛打学校监督，被苏抚端方饬吏捕拿。叶楚伦闻风离开学堂，避居友人柳亚子家中，幸免坐牢。这时，同盟会员、叶楚伦的表兄陈去病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因病辞职，推举叶楚伦代，叶遂由上海前往广东汕头。

1909年春，叶在汕头加入同盟会。他利用《中华新报》积极进行反清活动，和汕头、潮州、梅县的民党交往甚密，并建立俱乐部，组织“诗钟社”，表面是诗词花酒之会，实是联络民党人士的组织。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不少诗文中表达了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写道：“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以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嗟我一身不足惜，朝廷何以前烈。”③从一些诗词中不难看出，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是前进的。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因此广州总督张鸣岐视它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更加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伦和《新中华报》